

#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地图 变化与边疆研究的复兴

汪洪亮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 610066)

**摘要:**边疆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复兴,是政学两界应对边疆危机与国家危局的结果。国家大后方战略的调整、国民政府和众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内迁,促成了中国高校与学术地图的显著变化,原先远离边疆或并不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有了亲临边疆并研究边疆的机会,推动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促成了边疆研究格局的极大改观,使西南研究逐步取得了与西北研究可以等量齐观的地位。这段历史为我们理解与认识民国时期的政学关系打开了一扇窗户。

**关键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地图;边疆研究;西南研究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2-0005-11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及其格局变化,与抗战严峻形势导致的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和众多高校及科研机构内迁有很大关系。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沦陷,以东北大学为首的东北高校被迫迁往关内。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大量国家机关、重要工厂和众多高校纷纷迁至西部地区,极大改变了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和学术地图,原先远离边疆或并不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有了亲近边疆并研究边疆的机会,客观上推动了边疆研究的复兴,并且改变了边疆研究的格局。不少学者对高校内迁路线、办学活动及其意义作了论述,但迄今为止少有人探讨其与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复兴的密切关联<sup>①</sup>。本文拟根据相关史料对此一时期中国学术地图变化与边疆研究复兴及其格局改变做一述论。

## 一 国家抗战大后方战略的调整与中国学术地图的变化

近代以来,列国交相侵逼,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瓜分豆剖、边疆多事的局面,可谓“我国近百年来政治一种必然之演变”,不过“至‘九一八’而愈显著”<sup>[1]10</sup>。此前虽然“中国边疆的土地失陷和民族纷扰的事件,是数之不尽”,惟此尚属局部的危机,无碍大局,但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节点,“中国全部边疆”都到了“多事之秋”<sup>[2]2</sup>,中国朝野为之震动。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突袭上海驻军,致使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于受敌威胁境地;该年冬,日军进攻热河,直指华北,平津一带受其威胁,中原、洛阳、开封一带亦难安全。在美、英两国调停下,中、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南京形势趋缓,12月1日,国

**收稿日期:**2014-05-19

**基金项目:**本文系参与罗玲副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国难中的大学与社会: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中央大学研究”(11XJJCZH005)、凌兴珍编审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文化边疆建设与边疆教育转型——1935—1949年西部边疆师范教育研究”(11YJAZH05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汪洪亮(1976—),男,四川峨眉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边疆学术史研究。

民政府迁返南京。

东北沦陷后,日本加紧图谋中国大陆的步伐,华北、华东、中原一带并非安全之地,而西南又未纳入国民党势力统辖范围,西北遂成为朝野最看重的抗敌后方根据地。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在内陆地区另觅安全之地以为首都,先是决定迁都洛阳,以西安为陪都,初步计划以西北为长期抗战之后方根据地。国民政府在洛阳召集国难会议,中心议题就是以“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地,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sup>[3]1748</sup>。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积极酝酿打造西北根据地,加紧对陪都西安和行都洛阳的筹划与建设,通过《开发西北案》,设立行政院直辖的西北拓殖委员会和全国经济委员会所辖的西北办事处,提出建设西北边疆就是保卫“国家生命线”<sup>[4]</sup>,从而引发“西北开发”的热潮。那时政、学两界对此亦多有议论。戴季陶指出,中国“已在日俄包围之下”,应将边疆建设重心放在西北<sup>[5]35-37</sup>。经济学家周宪文认为,“东北业已版图变色,西北又已岌岌可危,为免使西北为东北之续,固急从事开发巩固国防”<sup>[6]5</sup>。宋子文更说:“西北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现在沿海沿江各省着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sup>[7]</sup>邵元冲注意到,当时“持长期奋斗之说者,力主西北之建设,以保持民族之生命线”<sup>[8]</sup>。1933年8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大战未起之前,应重点经营西北与四川;1934年10月18日,蒋介石在兰州表示:“极思经营西北,以为复兴之基地。”<sup>②</sup>可见,至少在1930年代前半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西部建设方面偏向倚重西北地区。

国民政府以西北地区为抗战大后方,着力建设西安以作陪都,却因西北物产贫瘠、人力匮乏而并非抗战根据地理想之选。而当时的西南各省,尤其是四川,尚处于军阀混战中,尚未为国民党势力所掌控。但是,四川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人口众多、物产丰富,除了重庆有航线和公路通向西安,还有国际交通线,即使东部沿海被敌封锁,仍可与国外联络,能够支持长期抗战,因而逐渐为国民政府所关注。自1935年蒋介石势力入川,西南政局发生显著变化,不仅四川防区制解体、川政统一、川军整编逐步推进<sup>[9]</sup>,而且贵州、云南也渐为国民政府所直接控制,这种政局变化促成了抗战后方战略根据地由西北向

西南的逐步转移。1935年3到10月,蒋介石用8个月时间穿梭于重庆、贵阳、昆明、成都等地,先后发表49次讲演或训示,反复强调西南地区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不过,此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虽加紧建设西南,但对西北的经营并未止歇,西北和西南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抗战后方部署中处于并驾齐驱的态势<sup>[10]5-13</sup>。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华东风雨飘摇,更使边疆危机达于顶点,“近来敌人侵占越南,断绝我滇越国际路线,复煽惑泰国,乘我抗战紧张之时,藉口民族自决,诱骗我边民,策动侵略,为其张目,更在西北煽动蒙回自主独立,意图分化我之团结,而我国人多注意内地各省之战事发展,殊不知敌人窥伺边疆野心之险毒,并不亚于侵袭内地”<sup>[11]114</sup>。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sup>[12]</sup>12月,国民政府在重庆办公。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政府全部机构迁驻重庆。1939年5月5日,重庆被确定为行政院直辖市。与此同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亦随之西移。西南地区后来居上,成了“抗战建国”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政治军事地位陡然提升,政府与民间对西南地区均寄予厚望。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指出:“今后长期抗战之坚持不懈,必有赖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开发,以为支持抗战之后方……故开发建设西部各省者,以巩固抗战之后方,实与普通奖掖国民经济之发展,同其重要也。”<sup>[13]298</sup>

国民政府从倡言“西北建设”,而至“西部建设”,明确提出坚持抗战“有赖西南西北之迅速开发”,可见其边政重心从偏重西北向统筹西部转移,西南边疆地位明显上升。地理学家胡焕庸指出,僻处西南的川、康两省,“在过去一向被视为边鄙之地,很少有人加以注意”,但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国府西迁,重庆定为行都”而一变而为“畿辅要地”<sup>[14]26</sup>。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即以最大范围涵义之西北、西南而论,“省区虽多,面积虽大,若论其人口之众,物力之富,西北西南任何其他省区,无有能及四川者,即以全部西北西南其他省区合计,亦不能超过于四川”,“盖天予中国以此复兴之根据地

也”；西康地位也极其重要，“非特足以拱卫四川，抑亦巩固边藩所必须也”；“全国上下，对于川康之期望甚殷，川康对于全国之责任亦愈大。川康建设完成之日，亦即抗战建国完成之时，愿全国人共勉之”<sup>[15]35-36</sup>。从“边鄙之地”变为“畿辅要地”，最能体现西南边疆在国民政府的边政布局中地位的提。此后一段时间，抗战大后方的重心主要放在四川和西南地区，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基础奠定后，蒋介石提出“西南是抗战的根据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西南与西北的战略地位又趋于平衡。随着抗战的最终胜利，西部地区的抗战后方地位随之结束。

国民政府西迁，促成了中国权势的一次重大转移，很多重要的政府部门、工业设施和教育、科研机构都向内地相对安全的地方迁移，导致中国高等教育与学术地图的显著变化。

抗战爆发前，我国各项文教事业已初具规模，但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失衡性。无论是国立、私立还是教会高等院校，大多集中在华北、华东、东南沿海沿江地区，中西部地区则寥若晨星。根据国立中央大学于1936年编制的《全国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一览表》记载，北平有北大、清华、北师大、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16所，天津有南开大学、北洋工学院等7所，上海有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27所，南京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等5所，广州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8所，杭州有浙江大学、杭州艺专等4所，福建有厦门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4所，山东有山东大学、齐鲁大学等3所，湖北武汉有武汉大学、华中大学等6所，湖南有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等2所，江西有工专、农专、医专等3所，四川有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重庆大学和西南美专等4所，其余高校零星分布在若干省份，而贵州、宁夏、青海等省则没有一所高校<sup>[16]300-323</sup>。西部省区高校总数尚不及北平之多，亦不如上海一半，且学术水平普遍低下。这种东众西寡的高校畸形布局，在抗战军兴后却因众多高校内迁而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高校与学术地图亦随之幡然改观。

高校云集的华东、华北，是中国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也是日本全面侵华之初侵略与轰炸的重点目标。1938年，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秀即言：“在此次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者为高等教育机关，即所谓专

科以上学校。敌人轰炸破坏，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主要目标。”<sup>[17]</sup>中国高等教育受到日军严重摧残，对中国的抗战建国事业极为不利，中国政府当务之急就是转移这些重要的工商业和高教机构，以保存经济和文化实力。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战时教育协会，负责高校迁建，同时对部分高校进行合并、重组。据统计，抗战时期，全国累计100余所高校内迁，西迁高校多达80余所，迁入地主要有三个地区：一是西南地区，有61所，二是西北地区，有11所，三是部分战区省份，如广东、广西、江西等相对偏居的内地省份；内迁高校在西部的分布依然不均衡，西南地区独占鳌头，青海、西藏、宁夏等地仍无高校；就西南而言，四川名列榜首，达48所，主要集中在重庆和成都，重庆、成都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成都华西坝、重庆沙坪坝、江津白沙坝和北碚夏坝则因学府毗邻、学子如云而被誉“文化四坝”<sup>[18]71-73</sup>。这显然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迁重庆、重庆升格为“陪都”是分不开的。

与高校内迁相伴随，过去高校数量少得可怜的中西部地区，汇聚了众多学者、学科及学术出版机构，而且这些高校在抗战结束后复员原地时，还为当地留下了不少师生、学科及图书设备，从而新建了不少高校，如“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即源自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川北农工学院”即由留川的东北大学师生所继兴等。据社会学家孙本文估计，抗战期间，“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sup>[19]261</sup>。西迁高校极大地促进了当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进步。如西北联大，虽后世声名远不及西南联大，但它却为西北繁衍了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医学院及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五大院校，将理、工、农、医以及师范等整个教育体系留在了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sup>[20]</sup>。西南联大系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合办，在昆明办学8年，改变了云南此前仅有云南大学一所高校惨淡经营的局面。抗战期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抓住西南联大、中法大学、同济大学迁徙来昆的机会，广揽人才，如原系联大教授的郑天挺、刘文典、费孝通、严济慈、华罗庚、陈省身、张奚若、冯友兰、潘光旦、向达、吴晗、邵循正、贺麟、尚钺、浦薛凤、钱端升、姜亮夫等，都在云南大学兼课或专职工作。据统计，抗战爆发前，云南

大学只有教师 51 人,其中专、兼职教授 39 人;到西南联大北返后,云南大学还有教师 237 人,其中教授 102 人,师资力量相当雄厚<sup>[21]332</sup>。最早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发展成为一个门类齐全、院系众多、规模最大、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性大学;学生人数由迁校前的 1072 人,到 1946 年复员前达到近 5000 人;课程数目一学年合计 827 门,较迁渝前多一倍;新增的科系多达 20 余个,到复员前达 47 系;教职员人数复员前已逾千人,较迁渝前增长了一倍<sup>[22]207</sup>。至于迁至成都华西坝联合办学又相互独立的教会五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燕京大学与本处于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同样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高等教育品质与结构,毋庸赘言。

从学术成果发布的载体即刊物和出版社的情况来看,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学术地图的显著变化。先以云南为例,在 1937 年前,该省仅有《云南国民日报》、《云南日报》等数种报刊;抗战期间,该省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出版各类报刊 312 种,其中学术类期刊即有 30 多种,如《边疆人文》、《西南边疆》、《西南研究》、《建国学术》、《社会科学学报》等<sup>[23]23-24</sup>。再如重庆,且不说移驻重庆的党政军系统各级机关复刊或创办的各类业务刊物,单是各类全国性社会团体尤其是文化团体迁渝,就导致数百种刊物创立或复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老牌大型出版社移驻重庆,带动了大批出版机构应运而生,至 1942 年时,重庆已有出版社 114 家、杂志社 193 家、印刷所 122 家,迅速确立了重庆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sup>[24]61-64</sup>。战时中国出版业,较之战前实际上有明显倒退,但就西部地区而言,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时期,时人断言,当时重庆图书销量比抗战以前的上海还要好得多<sup>[25]</sup>。在高校云集的川滇地区,出版事业的空前繁荣,显然是包含了大量学术著作出版在内的。这也颇能体现那时中国学术地图的变迁。

除了大学,不少研究机构也奉命迁移。以中央研究院为例。该院总办事处 1937 年 11 月由南京迁到长沙,1938 年 2 月迁到重庆,先后设址于曾家岩、上清寺、牛角沱,1944 年春迁至国府路;下辖研究所在迁到重庆前,多辗转于长沙、桂林、贵阳;至 1945 年,中央研究院共有 14 个研究所(含筹备处),分置于重庆、南溪李庄、昆明等地<sup>[26]</sup>。

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内迁是中国教育和学术资源

布局的一次重大调整。这次迁移调整改变了战前高校和科研机构东多西少的格局,学者分布较抗战前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学术地图,对中国边疆研究复兴起到了刺激和推进作用。

## 二 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及其格局变化

中国“边疆研究”源远流长,自《史记》以列传记述“西南蛮夷”事迹起,历代史书中的“蛮夷传”乃至部分“外国传”,均可视为“边疆研究”的成果。

近代以来,中国出现过两次边疆研究高潮,分别以清季“西北史地学”和民国“边政学”的兴起为代表。自 19 世纪中叶起,在列强胁迫下,中国被迫多次割地赔款,边疆研究受到众多学者关注,徐松、沈垚、龚自珍、俞正燮、张穆、何秋涛、魏源、徐继畲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大多讲求经世致用,潜心研究西北边疆史地,撰写了不少边疆史地著作<sup>[27]34-89</sup>。进入 20 世纪以后,列强得寸进尺,继续蚕食鲸吞中国边疆地区,尤其是日本 1931 年侵占东三省、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以中国为基地征服世界,使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与边疆危机。伴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西移,在政、学两界的倡导和鼓励下,国内兴起了关注边疆和边政的热潮,有学者更提出了创立“边政学”的构想<sup>③</sup>。

关于近代两次边疆研究尤其是抗战前后中国边疆研究趋向的变化,顾颉刚、徐益棠等学人已有较为精辟的论述。1936 年 1 月 2 日,顾颉刚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学之旨趣》一文中指出,清代道光以后,“中国学术界曾激发边疆学之运动,群以研究边事相号召;甚至国家开科取士亦每以此等问题为策论。察此种运动之起因,实由于外患之压迫”,因与俄国土毗邻,“当时学者之精神群集中于西北”,“及俄患稍纾”,“此轰轰烈烈之边疆学运动乃渐就消沉矣”,因此,他呼吁“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深信“此第二回发动之收效必远胜于第一回”<sup>[28]215-222</sup>。边疆研究在 1936 年还需要发动,可见在顾颉刚看来,边疆研究在那时还未形成“运动”。顾颉刚此文是回顾“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颇能表明两次边疆研究高潮的内在联系,相对于清末曾经“激发”而后“消沉”的第一次边疆研究,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兴起可谓是“复兴”。1942 年,徐益棠在《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指出,1930 年前,“边疆问题已有相当严重”,但“中

央因谋内部之团结,注全力于整齐军政,以谋各方之协调,心目专囿于一隅,固未尝措意于边疆”,学界此时虽组织不少考察团,但所注意者,“大多为纯粹之自然科学,边疆上的实际问题,常被视为外交或内政之问题”,“其时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尚无人注意,而民族学者我国之幼稚,在当时亦毋庸讳言”;九一八后,中国边疆形势更加恶化,学术界过去“论边疆问题者每推其原因于帝国主义者之挑拨”,后逐步认识到“民族的因子实居其重心,文化的低落,又为其根本之原因”,各边疆省份对边疆教育和民族研究逐渐重视,“中央对于各边区,亦改变其昔日羁縻与放任之态度,而以研究为施政之根本大计”,“一般普通学术机关及教育机关,亦渐知边教之重要而力加推动”,此时的民族学也因很多学者投入边疆问题的学术研究和通俗撰述而奠定基础;抗战军兴,国府西迁,各学术机关亦相继迁至后方,“一部分学术界,得安心工作于边区,并获得相当珍贵之边疆民族材料”,国民政府也积极谋求开发后方各省,以为长期抗战之准备,部分边省也“感觉其地位对于抗战建国之重要,纷遣代表,向中央接洽”,其中以西康最为积极,邀请多个考察团入康调查,此后边疆考察团“风起云涌”,著作层出不穷,边疆风物展览和博物馆建设逐渐盛行,“研究边疆之学术团体,亦如春笋怒生,互相竞长,大都集中于陪都重庆,或战前已有组织而随政府西迁者”,各种边疆研究期刊也相继创办;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颁布了边疆施政纲要后,政学两界在边疆研究和边疆建设方面的互动与配合趋于紧密,全国边教会议举行,中国边政学会成立和《边政公论》的创刊,亦聚拢了大批学者<sup>[29]51-56</sup>。

随近代中国边疆危机日益深重,尤其是日本入侵,国家存亡和民族兴衰的严峻问题摆在国人面前,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边疆开发建设成为迫切需要,极端薄弱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局面亟需改变。冯家昇指出,中国边疆研究不能依靠或者停留在国外学者已有成果上,应以自己的立场做自己的研究;他进而警告国人:“中日战前有‘朝鲜学’,朝鲜以灭;日俄战前有‘满鲜学’,辽省以陷;‘九一八’以前有‘满蒙学’,四省以亡。今之日人又高唱所谓‘东亚学’了,呜呼!剑及履及,事至迫矣,请看明日之东亚将为谁家天下?愿我国人醒醒吧!”<sup>[30]</sup>不少学者都强调,中国学人在边疆研究方面不能落在外人

之后。李安宅指出:外国对中国边疆的研究都走在中国人的前面,而国人“向来对于边疆的注意太少”,以前对边疆的认识多是“误解”或“偏见”,应趁着抗战建国的特殊局面,在边疆研究方面“迎头赶上”<sup>[31]3-4</sup>。柯象峰注意到:“晚近我国人士,注意边疆问题之研究者日众,抗战以来,政府注意尤亟,学人亲涉边区作科学之探究者更众,实为可喜之现象。”<sup>[32]47</sup>言心哲也认为:“自抗战军兴,我国边疆的重要,引起全国上下的注意,政府对于边疆的建设与开发,学者对于边疆的调查与研究,渐加注意,这是一种从来未有的良好现象。”<sup>[33]77</sup>

这种“良好现象”的产生,显然与抗战时期中国学术地图的巨变有着密切关联。由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内迁,大量学者移驻西部省区,边疆地区引起了不少学者关注和研究兴趣,边疆研究的几个中心地带由此形成。四川(包括重庆)堪称边疆研究第一中心,从事边疆研究较有影响者有:中央大学的丁骞、戈定邦、胡焕庸、严德一,复旦大学的沙学俊、言心哲、卫惠林,中央政治学校的萨孟武、肖铮,蒙藏学校的胡耐安(以上学校在重庆);燕京大学的林耀华,齐鲁大学的顾颉刚,金陵大学的徐益棠、柯象峰、马长寿,华西大学的郑德坤、李安宅(以上学校在成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吴定良、芮逸夫、马学良等;另有蒙藏委员会的周昆田、楚明善、孔庆宗,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凌纯声,国防委员会边疆问题参事吴文藻等,对边疆研究也有相当热情。云南是边疆研究的又一中心,大批学者云集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倡导和从事边疆研究的,先后有:在西南联大工作的陶云逵、向达、陈达、潘光旦、吴景超、李景汉、李方桂,在云南大学工作的吴文藻、费孝通、杨荃、李有义、白寿彝。此外,还有地处陕西的西北联大李式金、王均衡、谢再善、黄国璋,地处贵州的浙江大学张其昀、谭其骧及大夏大学吴泽霖、陈国钧等,一度迁到云南的中山大学杨成志、岑家梧、王兴瑞等。这些学者几乎构成了那一时期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基本队伍。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原本既不研究边疆历史文化,亦不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研究,更没有实地调查研究的习惯,但是到了边地以后,很多学者投入到了边疆研究中。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学者就是顾颉刚。他本来是个专注古史的书斋学者,虽然在主持《禹贡》半月刊期间,已对边疆研究有所关

注,但其重心仍在古代边疆地理沿革。他在燕大尚能读书治学,不暇常居边疆,虽有边疆游历,但其言论仍多本于文献,所论者多为史地;他真正深入边区和研究边疆,还是在七七事变之后,他由于办理通俗读物宣传抗日,整理边疆历史揭露日本恶行,领衔发表时局宣言,而遭致日本嫉恨,并在获悉其上了日本欲捕学者名单后,被迫离开北平,远走边疆<sup>[34]42-49</sup>。罗常培原是语言学研究者,在抗战时期,他将语言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采用实地调查方法,对西南民族语言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再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三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等重要论著。

即使是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些学者,如吴文藻、李安宅等,一开始对边疆研究也关注甚少。吴文藻虽然长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工作,但其工作重心是倡导汉人社区研究、引进西方学术理论及培养研究人才,与边疆研究并无关涉;他是到了云南大学后才鼓吹边疆研究,为云南大学创立了社会学系,后来更是直接进入政府部门从事边疆工作。李安宅1938年前出版的若干论著,多为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的著译;七七事变爆发后,在陶孟和与顾颉刚的建议和支持下,李安宅代表燕大与科学教育馆搞合作调查,抛家别雏,绕道香港、越南至西北,1939年初抵达拉卜楞,开始深入甘南藏区独立做调查研究工作,并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作了长达三年之久的实地考察。

学术地图变化对边疆研究的积极影响,当时不少学者就有体认。马长寿注意到,“民国二十五年以前,中国学术界曾一度呈现突飞猛进的进步,但自抗战军兴,这种进步现象停滞了。国家的财力人力都集中于抗战。学术界人士虽然靠他们的修养有素,固守岗位,不愿见异思迁,但是因为生活的物资不足,研究的设备不够,所以影响研究心情与工作效率,使前后工作不能相接,或者进行弛缓。”他随即声明:“不过,这种说法不能包括边疆研究在内,尤其是西南边疆的研究,它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至少由研究的人数上来说,实有‘空前绝后’之感”,“边疆研究似乎成为一种显学”;追其原因,“主要由于政府西迁,人文荟萃于西南一隅”,其次,对于边疆,“朝野视听再不如以前之忽略、羁縻,而须周密考察,以作怀柔

训练利赖之资”,第三,“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无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其所学学科与边疆有密切之关系,其谈也固无不宜。然一般不相干的人士,或劳驾远征,或闭门坐谈,亦往往以边事边情为集注之点”,“此殆把握现实,揣摩时髦,以自列于通达之流”;语其结果,一是“无论公私机关,或学术的与政治机关都先后成立研究边疆的机构”,组织各类边疆研究的学会或考察团体,二是出版物众多,不少调查报告出版,研究边疆的专门期刊“无论是在数量或品质上较战前进步多倍”<sup>[35]1-4</sup>。学者关注边疆研究,多是因时就势,若无视此“时髦”学问,就有“不识时务”之忧,而各科学者都关注边疆,“不相干的人士”也群集关注边事,最可说明当时各科学者对边疆研究的共同参与。

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复兴,既与中国政局及伴随的学术地图变化有着密切关联,也是政、学两界共同倡导和实践的必然结果,其学术行为具有群体性和组织化特点,如学者多来自高校、研究机构和学会等学术社群,而且在发表和传播研究成果的途径上充分利用了现代传媒如报纸、期刊等。这与清代中后期西北边疆研究是少数学者(部分具有官员身份)的个体行为大不相同。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研究的复兴,可以说是那一时期学术界的一个亮点。

国家抗战后方战略的调整,不仅导致中国学术地图显著变化,促成清季兴盛而后沉寂的中国边疆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复兴,而且也改变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格局。西北研究自清季以来是边疆研究中相对显要的领域,在1930年代的边疆研究中仍然是重心,但西南研究在抗战时期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并逐步取得了可以与西北研究等量齐观的地位。

民国很长一段时期,政府的边政重心主要在蒙、藏、新等地,对其他边疆地区少有提及,或不将其与蒙藏等地作为边疆施政区域同等对待。边政主持者往往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内域,认为国家“应尽量少有特殊化的人民与特殊化的地方,西南苗夷区域,数百年来在政治的治理上既没有显著的特异形式,最好使其自然而逐渐地整个同化”<sup>[36]11</sup>。抗战军兴后,西北、西南部分省区虽被国民党政要屡屡提及,其开发建设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但其“边疆性”仍少有得到确认。官方对“边疆”没有固定见解,各自表达的空间很大。反观学者们的认识,同样多歧。尽管对边疆的多种涵义已有初步认识,但侧

重蒙、藏,兼顾其他,重视陆疆,忽视海疆,应是国民党边疆观念的基本特征<sup>[37]</sup>。但已有很多学者认识到,在边疆研究中,西南边疆研究尤显薄弱和值得重视,而且力图纠正其偏向。陈玉科早在 1933 年就注意到,北伐成功后,“有识之士,咸以建设边疆为急务,调查研究之团体,鼓吹宣传之书刊,所在多有;然皆偏于东北、西北,其注意西南者,盖鲜焉”,但西南在国防、经济上之地位应与东北、西北同等重要,不能偏废,而国人对西南边疆问题较为淡漠,“吾人生斯长斯,对于西南边疆犹尚不从事考察研究,则致著文讲演,亦须取材于外国人士之著述,则中原人士之漠视西南,又何怪乎?此不可不立起直追,作有系统之调查研究,以为全国倡导者也”<sup>[38]</sup>。1937 年,江应樑注意到,今日国人好谈“民族复兴”,但对国内民族的认识“极端隔膜”,尤其对西南民族有诸多“谬误见解”,少有人到西南边地实地调查,“在欧美以至日本学术界中,却有不少专门著述……今日国人欲求知晓自己国内的民族,反不能不从外人著作中寻取资料”,国人对此应该深觉“内愧”<sup>[39]</sup>。

在国府内迁后,西南研究相应跟进,逐步达到了与西北研究可以等量齐观的程度。以期刊而论,《新亚细亚》和《边政公论》作为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的边疆研究代表期刊,前者主要关注西北边疆,后者则更多关注西南边疆。很多过去研究西北的学

者,在 1940 年代将学术兴趣逐步转移到西南,顾颉刚、李安宅等人的边疆学术研究都有这样一个转变过程。顾颉刚是先到西北,后到西南,在云南工作期间,发表了著名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起政学两界广泛关注,后又组织中国边疆学会,成为边疆研究的重要领军人物<sup>[34]</sup>。1941 年,李安宅从西北受聘到成都的华西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创办边疆研究所,撰写了不少有关康藏社会、宗教及文化等情况的论著,还就如何加强和改进边疆文化经济及社会工作写了不少言近旨远的文论;以李安宅为中心的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的众多学者,如冯汉骥、蒋旨昂、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玉文华等,都对康藏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发表了若干论著<sup>[40]</sup>。

大量边疆社团和边疆刊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相继出现,成为边疆研究的主要推动者和研究成果发布平台。如果对此 20 年间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做一个统计(参见表 1),我们不难看出西南研究呈现增长态势。边疆团体在 1930 年代多以西北为研究对象,而在 1940 年代则多以整个“边疆”为研究对象,表明那时学人对边疆研究对象的理解有了很大拓展,从侧重西北到统筹西南西北转移。

表 1. 部分边疆研究与学术团体

学术团体	成立时间	成立地点	主要负责人	出版刊物	备注(宗旨)
华西协合大学 华西边疆研究会	1922	成都			
筹边协会	1924	北京	吴史铭、黄成序、顾训忠等	《边事》	
中华西北协会	1924	北京	薛笃弼	《西北》	调查西北边境实况,研究该地教育、实业、交通、经济之发达方法。
清华大学边疆研究会	1928	北京	朱希祖、张星烺、翁文灏、罗家伦		切实研究边地之地理形势、社会状况、天产富源、外人势力、政治现象及其他与边地有关之各种重要问题,期得确切之知识及妥善之解决方法。
西北文化促进会	1929	北京	王平等	《西北》	研究西北问题,发展西北实业,促进西北文化。
新亚细亚学会	1930	南京	戴季陶、马鹤天等	《新亚细亚》	信行三民主义,发扬中国文化,复兴亚细亚民族。
金陵大学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	1930	南京		《边疆研究通讯》	调查边疆实况,研究边疆建设,提倡边疆生产,研习边疆文字。

开发西北协会	1932	南京(后迁西安)	陈立夫、戴任、马鹤天等	《开发西北》	1936年更名为西北建设协会。
中山大学西南研究会	1932	广州	杨成志等		挽救国家危亡,发扬科学探讨,唤醒政府及民众注意西南边疆问题与设施。
西北问题研究会	1933	上海	胡庶华、林康侯、郭维屏等	《西北问题季刊》	研究西北史地,供给开发西北材料,巩固国防。
蒙藏委员会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	1933	南京		《边疆通讯》	
西北论衡社	1933	北平	白宝瑾、靳仙舟等	《西北论衡》	
西北春秋社	1934	北平		《西北春秋》	
禹贡学会	1934	北京	顾颉刚、谭其骧等	《禹贡》	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
边事研究会	1934	南京	朱霁青、赵丕廉、白云梯、唐柯三等	《边事研究》	研究边疆问题,唤起国人注意边事,促进政府开发边疆,以期巩固国防,复兴中华民族。
中国民族学会	1934	南京	黄文山、凌纯声、徐益棠、胡鉴民等	《西南边疆》、《民族学报》	联络全国民族学会,提倡民族科学,调查研究边疆民族,发表关于民族科学之刊物及丛书。
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边疆教育研究委员会	1935、1939	南京、重庆	丁惟芬、戴季陶、陈果夫、何玉书等		负计划指导边疆教育设施之责。
边疆史地学会	1937	北平	袁复礼		清华大学历史系、地学系联合创立。
西北史地学会	1937	西安	张鹏一、徐炳昶、梁午峰、黄仲良		研究西北史地学术,发扬民族文化。
西北研究社	1939	兰州	梅贻宝、熊德元、朱允明等	《西北研究》	从事西北问题研究,以促进西北文化,开发西北富源,改善西北人民生活,增加国家民族力量。
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	1939	重庆	马亮、卞宗孟、赵石溪、许崇灏等	《边疆研究季刊》	促进边疆文化,加强民族团结,集中力量,宣扬国策,以完成抗建大业。
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	1939	重庆	张西曼、杨成志、马鹤天、常任侠、陈纪滢、黄文山	《边疆研究》周刊	宏扬边疆学术,团结民族感情。
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	1939	重庆	顾树森、陈立夫、朱家骅等	《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报告》	研究边疆教育之办理原则及各项实际问题,筹拨及审议推进边疆教育各种方案,调整边疆教育机关及经费,指导边疆青年升学就业等项。
中国边疆学会	1940	重庆	赵守钰、黄奋生等	《中国边疆》月刊	研究中国边疆学术文化及政教、经济、时候等问题,拟具治边建边方案,贡献政府采择,促进民族团结与建设边疆。
中国边疆建设协会	1940	重庆	于右任	《中国边疆建设集刊》	侧重于西南边疆研究。
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	1942	昆明	黄钰生、冯文潜、陶云逵	《边疆人文》	以边疆人文为工作范围,以实地调查为途径,协助推进边疆教育。
中国边政学会	1941	重庆	吴忠信	《边政公论》	阐发边政原理,备作边政实施之张本,并以研讨边疆政治文化及其实际问题,供边疆建设之参考。
华西大学中国边疆学会	1941	成都	张凌高、李安宅等		以实现民族团结、建立国防力量、开发富源为目的,对边疆进行调查、研究、设计。

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	1942	成都	张凌高、李安宅、任乃强等	《党军时报·边疆周刊》、《边疆月刊》、《华西边疆研究年刊》	促进边疆研究科研、教学与实地考察等工作。
金陵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边疆研究室	1942	成都		《边疆研究通讯》	以中国边疆民族文化与边疆社会问题为研究范围。
东北大学东北问题研究社	1944	四川三台	陈震、李康等		研究东北,收复东北。
贵州省政府边胞文化研究会	1945	贵州		《边铎》	开发边疆,改进边胞习俗,提高生活、文化水准。

说明:“备注”栏所列宗旨大多参考其“章程”或“工作计划”及相关工具书。因所涉甚繁,表中从略。

资料来源:马大正、刘逊《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韦清风《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与国防战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房建昌《简述民国年间有关中国边疆的机构与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华西协合大学1910-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119页等。

表1所列边疆研究团体大多办有刊物。学术刊物是研究成果发布和传播的重要平台,学术论文因其问题意识和针对性强,成为学者表达学术见解和研究成果的最重要形式。正如《边疆通讯》发刊词所指出的,边疆研究团体“分布在边区或国内各地,东西南北,相距遥远,加以交通的阻隔,彼此之间,工作上的联系,极感缺乏,当然更谈不到消息与资料的交换”,而学术期刊的发展可作“相互间的一个传导工具”<sup>[41]</sup>。

从表1还可看出,东北边疆沦陷最早,也较早受到国人瞩目,东北研究团体成立较多,如东北青年学社、东北行健学会、东北前锋社、东北论坛社、东北问题研究社、东方快报社、北强学社等,但多昙花一现。东北沦陷后,西北地位凸显,西北研究蔚然成风,但大多存在时间短、影响亦小。如汪昭声所言,“民二十年间,研究边疆之团体,风起云涌,全国统计,三十有七”,到后来却仅存一、二,原因在于“有志之士,互不相下,各树一帜,以相标榜,力量既分,成效斯渺”,所以没有形成规模较大的研究团体;而且这些小团体“徒事宣传,不务实际,竞出刊物,不事生产,经济不充,终于失败”<sup>[42]2-3</sup>。西北研究的式微,显然与国家重心渐向西南转移有关。后来学人之所以热衷于西南边疆研究,据马长寿分析,是因为“中央播迁西南,川康藏滇边区成为中央的要屏。西南边区人民在战略上与政治上有举足轻重之势。故朝野视听再不如以前之忽略、羈縻,而须周密考察,以作怀柔训练利赖之资”,“抗战时期,边疆研究似乎成为一种显学。逊清末叶,名公巨卿,好谈西北问题,一时风起云会,莫不以谈西北为识时务之俊杰。抗战

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sup>[35]1-4</sup>。

从“谈西北”到“谈边疆”,显然,抗战时期,“西北研究”也不能涵盖边疆研究范围,西南研究此时已受到学者普遍重视,已取得了与西北研究等量齐观的地位。伴随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迁移到西南地区,成都华西坝、云南昆明逐渐成为抗战时期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中心。华西大学“驰书基督教各友校迁蓉”,“既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齐鲁两大学均先后莅止,而燕京大学亦于太平洋战起被迫解散,旋即复校成都,于是有华西五大学之称”,五大学资源共享、联合办学,成为战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联合体,可谓学界忽略了的“西南联合教会大学”<sup>④</sup>。五大学建立了不少边疆民族研究机构,集中了顾颉刚、李安宅、徐益棠、任乃强、林耀华、柯象峰、葛维汉、郑象铤、谢国安、刘立千等众多边疆学者,他们对川西北、康藏及西藏地区研究着力甚多,产出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sup>[43]118-119</sup>。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和经济研究所、云南地质调查所、西南联大学人参与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即魁阁),对云贵地区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sup>[44]66-70</sup>。吴文藻在云南大学主持社会学系期间,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张之毅、田汝康、史国衡、胡庆钧、林耀华、李有义等先后在此工作,形成了人类学界后来称道的学术共同体。陶云逵主持的边疆人文研究室,对哈尼、彝族、苗族、傣族等民族聚居地开展调查,搜集了大批口头和实物资料。西南联大的罗常培、闻一多、邢公畹、傅懋勳、高华年、马学良、袁家骅等学者对西南民族语言

的调查研究,陶云逵、马学良、吴泽霖、李景汉、陈序经、陈岱孙等一批著名学者对西南民族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陶云逵、马学良、吴泽霖、傅懋勤等对西南民族宗教的调查研究,在边疆学术史上占据了不可取代的地位。这些史实也为我们考察民国时期的政学关系打开了一扇窗户。

### 三 结语

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边疆研究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复兴,从根本上讲,是那个“过渡时代”政学两界应对边疆危机与国家危局的产物。在日本侵华加快步伐、中国抗战呼声正高之时,中国边政亟应改良,边民务求团结,已是政学两界人士的共识。“为政由学始”,只有深入调查研究边疆,才

能改良边政以利国家。国民政府西迁以后,西部边疆地位陡然提升,成为中国长期抗战大后方和中华民族复兴基地;大批学人进驻边疆,学术兴趣转移,促成了中国边疆研究的狂飙猛进。朝野各方或出台政策,或深入边疆,奔走各地调研,积极献计献策,对实现边政改良和国族建构付出了相当的努力。且因国家重心之转移及大后方战略之调整,西南研究呈现后来居上的态势,逐步取得了可以与西北研究等量齐观的地位,从而改变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格局。可惜,抗战结束以后,国民政府及众多高校、科研机构忙于复员返迁,此后几年中国又陷入内战,边疆研究因时局影响而再归沉寂。

### 注释:

- ①最重要者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学校》,《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之一,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侯德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 ②转引: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01 页。
- ③关于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参见: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 ④关于抗战时期华西教会五大学的办学情况,可参见:岱峻《风过华西坝:战时教会五大学纪》,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版。

### 参考文献:

- [1] 黄定初.帝国主义侵略下我国边疆之危机[J].边事研究,1935,2(5).
- [2] 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M].上海:生活书店,1937.
- [3] 汪兆铭.在洛举行国难会议之意义[G]//革命文献(38).台北: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
- [4] 宋子文.西北建设问题[J].中央周报,1934,(310).
- [5] 戴季陶,等.西北[M].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3.
- [6] 周宪文.东北与两北[J].新中华,1933,1(11).
- [7] 宋子文.建设西北[J].中央周报,1934,(309).
- [8] 邵元冲.西北建设之前提[J].建国月刊,1936,(2).
- [9] 黄天华.蒋介石与川政统一[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 [10] 潘洵.论抗战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抗战大后方”的内涵和外延[J].西南大学学报,2012,(2).
- [11] 西尊.边疆政治与教育问题——边疆开发与国防问题研究之一[J].地方行政,1941,2(2).
- [12]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J].四川省政府公报,1937,(100).
- [13]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G].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
- [14] 胡焕庸.川康两省在抗战期间应负的使命[J].新四川月刊,1940,1(10-11).
- [15] 胡焕庸.抗战建国与川康建设[J].中国青年,1939,1(5-6).
- [16] 全国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一览表[G]//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 [17] 顾毓琇.抗战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J].时事月报,1938,19(5).
- [18] 侯德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 [19]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二册[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
- [20] 刘海峰.历史需要诉说:西北联大的命运与意义[J].高等教育研究,2013,(9).
- [21] 孙代兴,吴宝璋.云南抗日战争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 [22] 罗家伦.国立中央大学回顾与前瞻[C]//文化教育与青年.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 [23]王勇,李琰,李杨.抗战期间云南境内出版的报刊[J].云南档案,2013,(7).
- [24]郝明工.试论抗战时期的重庆出版事业[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4).
- [25]钟究民.最近重庆市图书出版概况[J].出版界月刊,1943,(1).
- [26]孙宅巍.抗战中的中央研究院[J].抗日战争研究,1993,(2).
- [27]胡逢祥,等.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 [28]顾颉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学之旨趣[G]//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36.
- [29]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J].边政公论,1942,1(5-6).
- [30]冯家昇.日人对于我国东北的研究近状[J].禹贡,1936,5(6).
- [31]李安宅.自序[C]//社会学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 [32]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J].边政公论,1941,1(1).
- [33]言心哲.边疆社会调查与边疆社会改造[J].边政公论,1942,1(5-6).
- [34]汪洪亮.顾颉刚与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J].齐鲁学刊,2013,(1).
- [35]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边疆通讯,1947,4(4).
- [36]卫惠林.论现阶段的边疆问题[J].边政公论,1947,6(3).
- [37]汪洪亮.民国时期国人对“边疆”、“边政”含义的认识[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1).
- [38]陈玉科.弁言[C]//云南边地问题研究.昆明: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1933.
- [39]江应樑.评乌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J].现代史学,1937,(2).
- [40]汪洪亮.建设科学理论与寻求“活的人生”——李安宅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历程[J].民族学刊,2010,(3).
- [41]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发刊词[J].边疆通讯,1942,(1).
- [42]汪昭声.西北建设论[M].重庆:青年出版社,1943.
- [43]《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华西协合大学1910-1949)[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 [44]马玉华.西南联大与西南边疆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3).

## The Changes of China's Academic Map and Revival of Borderland Research during the 1930s and the 1940s

WANG Hong-liang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 The revival of borderland research during the 1930s and the 1940s is born out of the response of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to both border crisis and national crisis. The constant change in national strategy of home front, the inward movement of the KMT government and large number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research institutions contributed to the significant change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nd academic map. The scholars who originally had lived away from the border or had never been engaged in border research happened to gain the opportunity of experiencing and studying the borders, which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revival of the relevant research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search pattern. Consequently, southwest research gradually achieved the comparable place with its northwest counterpart. The history of this period opens a window for us to delv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academics in the era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the 1930s and the 1940s; academic map; borderland research; southwest research

[责任编辑:凌兴珍]